



张闻天独子张虹生 现代快报记者 刘玉莹 摄

我和父亲

我三岁开始坐牢,罪名是“政治犯”,单间牢房一住就是三年

我1939年冬天出生在新疆。当时,我母亲正从延安绕道新疆,准备前往苏联。我的突然降生,并没有打乱她的行程,她在我出生没多久后,就按照原先的计划前往苏联,临走前,她委托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照顾我。

我出生时,父亲正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,在延安主持党的工作。远隔几千里,他并不知道我出生的具体日期。我的身份当时是保密的,只有陈潭秋和他的夫人王韵雪等少数几个人知道。我的名字,是陈潭秋给起的,一开始是叫张宏声,虹生是10岁那年父亲给改的。

虽然父母都不在身边,但在新疆的日子倒也过得平静安稳。我3岁那年,一场变故突然降临。那是1942年9月,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以“督办谈话”为名,把陈潭秋等共产党领导人秘密软禁了起来。几个月后,盛世才又把陈潭秋等人关进了监狱。

大人们进了监狱,我们这些孩子自然也跟着去了,由于我父母都不在,监狱就给我安排一个单间牢房,我算是年龄最小的政治犯。和我在一个监狱的孩子,还有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,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三十多个。在监狱里一住就是三年。抗战胜利后,1946年夏,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,这才将在新疆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家属100多人释放出来。我也被放了出去,随后和毛远新他们一起,离开新疆,被送往延安。

10岁那年,在东北第一次见到父亲,彼此都很平淡

一路颠簸,等我到了延安,却没有见到父亲和母亲。原来,早在1945年10月,他们就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工作了。父亲在东北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东北满分局委员和中共合江省委书记。

在延安,我被送往洛衫杉托儿所,由保育员阿姨照顾。到了1949年,父亲打报告希望我能够去他身边,这年年底,我被送到了东北。我们见面时的情景很平淡,完全不像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描写的那样。我喊了一声爸爸,父亲只是微微一笑,伸出手摸摸我的脑袋,就让警卫员带着我离开了。

跟随父亲在东北的日子里,发生的几件小事,我一直都记得。

“

1949年,在东北的第一次见到父亲张闻天和母亲刘英。高高瘦瘦、面容严肃、戴一副眼镜,斯文中透着威严——这就是他对父亲的第一印象。带他的人说:这是你爸爸,快叫爸爸。张虹生张嘴喊一声:爸爸。张闻天微微一笑,伸出手摸摸儿子的脑袋,然后示意警卫员带儿子离开。

很多年后,回忆起初见父亲时的场景,张虹生说:“他很平淡。我也很平淡,父亲和母亲还没有托儿所的阿姨亲呢,没什么好激动的。”

张虹生讲述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整理



登录现代快报官网 www.xdxb.net, 或者扫描二维码, 可看采访实录

现代快报记者 刘玉莹 拍摄/制作



1925年

1935年

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

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党中央总书记



1951年

1959年

赴苏联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

在江西庐山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



1960年

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



1976年

在无锡鼋头渚长春桥畔留影,这是他人生最后一张照片

# 张虹生:我和父亲张闻天



1949年,张闻天与刘英、张虹生在沈阳

1950年3月,一家三口在中南海颐年堂住所

父亲想回国搞经济工作,主席不答应,认为他不谦虚,骄傲

父亲虽然人在苏联,但他其实不想搞外交,他对于国内的经济有一套自己的想法。1953年春,父亲从苏联回到北京,见到时任国家计委主席高岗时,表示想回国搞经济工作。父亲的要求没有被批准,没被批准的原因在后来的陈云给他的一封信中有说明:“主席对你有看法,说你太不谦虚,骄傲,还说不把你政治局委员拉下来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。”

主席为何觉得我父亲“不谦虚、骄傲”?我现在想,他们的分歧在延安时期其实就已经有了。

遵义会议后,很长一段时间,父亲和主席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默契,两人的关系也很好。但后来,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,主席觉得我父亲的那一套洋理论不实用,叫他“洋房子先生”。父亲觉得主席在军事上很伟大,但在政治和经济上并不十分内行。两人互相有点看不上。在延安期间,我父亲还综合大家的意见写信给主席,反对他和江青结婚。主席对此很生气,摆酒席的时候甚至没有请我父亲。从那以后,他们俩的关系就不太融洽,在我记忆里,父亲见了主席,就不怎么说话。

主席不让父亲搞经济工作,父亲就继续留在苏联。那时候,我在中共中央直属育英小学读书。由于父母都不在身边,我就住在和父亲关系很好的任弼时家里。任弼时家的后门一开就是彭老总家。我们那时候常去彭老总家串门,还会穿他的元帅服,威风威风。有时候会碰到彭老总和朱老总下象棋。他们两个下棋,我们一帮孩子就在旁边看,还给出主意,走这个走那个。朱老总是个特别慈祥的人,彭老总则显得严肃一点儿。

1951年,父亲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,前往莫斯科履职。母亲和我也一起去了莫斯科。父亲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(注:1945年6月19日,中央七届一中全会当选),这个级别的领导担任驻外大使,是非常罕见的,史无前例,后来也没有过。

在苏联期间,我记得父亲特别强调使馆工作人员要了解当地文化,他还请去苏联学习的舞蹈演员和音乐人才来使馆上课。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就来使馆上过课。到了周末,他会带我们去听芭蕾舞、听歌剧。离开苏联回国时,他把莫斯科大剧院所有上演过的歌剧和芭蕾的唱片都买了一套。

有一阵子,中央歌剧院排练《蝴蝶夫人》,还到我家来唱唱片。可惜的是,父亲在东北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东北满分局委员和中共合江省委书记。

在延安,我被送往洛衫杉托儿所,由保育员阿姨照顾。到了1949年,父亲打报告希望我能够去他身边,这年年底,我被送到了东北。我们见面时的情景很平淡,完全不像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描写的那样。我喊了一声爸爸,父亲只是微微一笑,伸出手摸摸我的脑袋,就让警卫员带着我离开了。

跟随父亲在东北的日子里,发生的几件小事,我一直都记得。



1955年,张闻天与毛泽东在一起



1954年,张闻天与周恩来在一起

1956年,张闻天与朱德在一起

化。到了9月,快开学的时候,王震伯伯找到我,说:“虹生你来,我跟你谈个事。”到了他那里,他让其他人都出去,单独留下了我。他说,你父亲犯错误了,你知道吗?我说不知道。他又说,你要站稳立场啊。

其实不用叮嘱,我也会站稳立场的。我那时候当然认为主席肯定是对的。我对这个事情产生疑问是到1962年之后了。

庐山会议后,到家里的客人越来越少。父亲这个人,和别人工作之外

家里又出了一件事。这回,是我出事

了。1961年,我正读大学三年级,再次下乡,被分配到一个叫东坝的公社。我负责一个生产小队的宣传工

作。我负责一个生产小队的宣传工作,怀着满腔热情到了那里,在实际调查,却发现农民的生活特别苦。

这个生产队一共有98户人家,我先后访问了96家,大家都反映在公社食堂吃不饱,因为总是有人多吃多占。怎么解决吃不饱的问题?大家一致提出解散食堂。见大家意见这么一致,我就宣布解散食堂。现在想想,恐怕我是全国第一个解散食堂的,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那么大

胆,简直是胆大包天。胆大的结果是,第二天,我就被调了回去。紧接着就是批斗,随后被勒令退学。我一个大小伙子,不能老在家闲着啊,就出去找工作,可是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,没地方敢接收我。王震伯伯知道了以后,说,那就让虹生来新疆吧。

1962年2月,我从北京启程前往新疆。离开家时,父亲正沉浸在《资本论》和列宁《新经济论》的研究中,对我保持着一贯的平淡。

第二年的春天,我才从信里知道父亲已经从北京到了肇庆。我再次探亲时,地点也就转移到了肇庆。

在肇庆,我发现,父亲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。他话还是不多,还是很严肃,但是对我比以前好了。以前,我离家时,他一般没什么表示,但在肇庆时,每次我探亲结束走的时候,他都会送我。他有病,心脏不好,路走到一半就走不动了,只好停下来休息,坐在那里看着我走。

探亲回家时,我会陪他出去走走。1975年,我陪他去广交会,他走累了,在会议室休息。会议室有很多杂志,英文、俄文、意大利文、西班牙语,他都拿过来看。他早年留学日本、苏联,还曾在美国勤工俭学,懂得七国文字,那些杂志他都能看懂。工作人员很吃惊,问我是谁,我说就是一个普通人。

1967年回家探亲,络绎不绝的“客人”让我吃惊

我到了新疆没多久,就患上了肝炎。由于医疗条件不好,后来发展成了慢性肝炎。我写信给父亲,希望能到北京治病。父亲很快回信了,一开头就说,你有什么资格来北京看病,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,都是在新疆治,肝炎完全可以在当地治,治得好最好,治不好就慢慢来。

父亲的这封信,让我心酸。我只好在留在新疆的农场,一边劳动一边治疗。

1966年夏天,文革开始了。从当年的8月起,父亲常常被拉去批斗,有一次,竟然被打得昏了过去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向来冷清

的家里,突然涌来了各种各样的人。来的人,有些是调查父亲的,有些是为调查别人而到父亲这儿来搜罗证据的。1967年,我回家探亲,对家里的这种景象很吃惊,我奇怪父亲怎么认识这么多人。父亲说,当然认识啊,都有工作关系。

在我印象里,父亲和别人一般都是工作关系,私人关系就和朱老总、任弼时交往比较多点儿,和总理也有些交往,但和大部分人私交都很少。总是这个人脸上看不出喜怒,讲话也是很严肃,直来直去。比如,西路军当初失败了,西路军将领回到延安,毛主席见了就说,只要人回来就好,有鸡就有蛋,有人就可以干出一番事。而父亲,则是很严厉地批评了人家。他的这种风格,就不大容易让人亲近。

1961年,我因为解散公社食堂被学校开除

就在父亲闲头读书的这段时间,

家里又出了一件事。这回,是我出事

了。1961年,我正读大学三年级,再次下乡,被分配到一个叫东坝的公社。我负责一个生产小队的宣传工

作。我负责一个生产小队的宣传工作,怀着满腔热情到了那里,在实际调查,却发现农民的生活特别苦。

这个生产队一共有98户人家,我先后访问了96家,大家都反映在公社食堂吃不饱,因为总是有人多吃多占。怎么解决吃不饱的问题?大家一致提出解散食堂。见大家意见这么一致,我就宣布解散食堂。现在想想,恐怕我是全国第一个解散食堂的,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那么大

胆,简直是胆大包天。胆大的结果是,第二天,我就被调了回去。紧接着就是批斗,随后被勒令退学。我一个大小伙子,不能老在家闲着啊,就出去找工作,可是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,没地方敢接收我。王震伯伯知道了以后,说,那就让虹生来新疆吧。

外地参观访问,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,不会给领导增加麻烦。”

父亲在北京的请求没有被批准。后来他又提出迁居家乡上海,如果上海不成,苏州或无锡也可以。最后的这个要求,被批准了。

1975年8月底,父亲到了离故乡130公里的无锡,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309天。

父亲到了无锡,我还是在新疆。我也是后来断断续续从母亲和警卫员那里听到一些他在无锡期间的

事情。有一次,他去游梅园,累了,就找个地方坐下。来了几个小青年,要照相,有个小青年说:老伯,让开一下,我们照相。父亲站起来让开。另一个小青年走过来,说:老伯,你坐着不用让。警卫员听到那个小青年随后对别人低声说话,大意是说,这个老先生风度不一般。

1976年7月1日父亲去世,两个月后我回到家

1976年7月1日,党的55岁生日,当天晚上7点30分,父亲突发心脏病逝世。父亲逝世的消息,我并不知道。两个月后,当我从新疆回来时,见到的只有父亲的骨灰盒了。

把我从新疆调到江苏,是父亲这辈子唯一为我开的一次“后门”。当时有政策,老领导身边可以有一个孩子,我是父亲的独子,父亲提出,希望把我调回江苏。他说只要是江苏,什么地方都可以。可是报告递上去,省里不敢批,转到了中央。父亲去世后,中组部才把文件批下来,把我调到南京,仍旧对口,到晓庄农场,就在黑墨营那里。

一张犁两头牛,在晓庄农场,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犁地。我地犁得好,当地的农民都不过我。我有经验呀,在新疆犁地犁了十几年啊。

1979年,我有个机会去北京,但是没去成。那年8月,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,追悼父亲,并为他平反。后来,中央成立了以邓力群为组长的编辑领导小组,由父亲的秘书何方具体负责选编《张闻天选集》。我是父亲的独子,被指定到北京参加编写工作,中组部的

调函已经开好了,交到了我手里。可是,当时母亲来江苏接父亲的骨灰回北京,苏联,还曾在美国勤工俭学,懂得七国文字,那些杂志他都能看懂。工作人员很吃惊,问我是谁,我说就是一个普通人。

在离故乡130公里的无锡,父亲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309天

1972年5月,中央决定恢复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待遇。此后,父亲多次要求回到北京。比如,在1974年写给毛主席和中央的信里,他希望能在北京度过晚年,同时请求批准自费到家乡上海和南京等地参观访问和

探亲,他说:“我现在已经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,身体不大好,思想和行动很迟钝,眼睛的白内障一直在恶化,阅读文件和书报日益困难,因此,我想在我不能走动或变瞎之前,看看我所热爱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

的新面貌。至于旅途上的一切费用,都可以用我们的存款来支付。我现在已经改名张普,作为一个普通的老同志,在

下(转A28版)